

□ 怀念师友

杨绛先生说：“我从来不唱赞歌、不唱高调，但我觉得十八大之后真的不一样了，现在是咱们国家最好的时候。”杨绛先生还说：“习大大、彭麻麻很好，很不容易，他们为国、为民、为世界和平而操劳。”我们都很赞赏也很惊讶她居然知道“习大大”“彭麻麻”这样的网络语言。

杨绛先生有次曾充满自豪地说：“我们国家是最好的，现在一切都很好。”她说此话的神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杨绛先生非常坦然地面对离别时刻

的到来，称之为“回家”。每当我们说“下次再来看您”时，杨绛先生会说：“我到时候还活着吗？”我们说：“现在是最好的时代。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杨绛先生笑着点点头：“是的，最好的时代！”

杨绛先生的人生是完美的！我永远怀念她！

2016年8月

（原载：《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周峻隆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2月）

“一二·九”运动81周年忆父亲何礼

○何吉林（1970无线电）

我的父亲何礼（原名何维登，字仲觉），1934年从辅仁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二年级学习。在清华期间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从此走上了为民族自立、



“一二·九”投身革命的清华学友1949年于沈阳合影。右起：陈舜瑶、宋平、何礼夫人郑延、薛公绰女儿、何礼、薛公绰夫人薛沁冰及儿子、薛公绰

国家富强而奋斗终生的革命道路。薛公绰（原名薛容），1932年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与我父亲是南京中学同窗学友，后来又又是清华明斋同宿舍好友。薛伯伯为人仗义，当年我父亲负责编辑进步刊物时，他可以舍财相助，但自己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是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埋头勤奋读书。可是在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军警数千人在清华校园搜捕要求抗日救国的进步学生时，他觉得与己无关，没有听从我父亲和其他同学劝说，照旧去生物馆做实验。当他准备回宿舍的时候，被军警不由分说抓了去，在监狱关了好几个星期。当他蓬头垢面被释放出来后，见到我父亲就说：“老何，我要参加革命！”他确实感到国难当头，清华园里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和薛伯伯参加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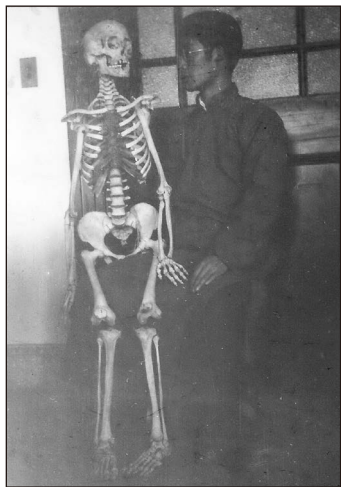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冬何礼于清华宿舍自习

华校庆活动回来，议论起有人说“当年参加学运的都是不好好读书的”，感到很气愤。他俩说：我们不好好学习，怎么可能在学生中有威信和号召力？当父亲去世后，我着手给父亲编辑纪念文集时忆起这件事，我觉得薛伯伯不用说，他是生物系蔡翘教授的得意门生，可我父亲当年在学校学习情况如何？我很想求证这件事。经过多方努力，我在清华校史馆、档案馆、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找到许多与我父亲在校期间有关的珍贵资料。根据线索，又请旅居美国的我的清华同学帮助，检索到我父亲当年的一项实验心理学发现，刊登在《美国心理学报》上，真是如获至宝！也算给父亲当年在清华的学习表现“正了名”。

从这些材料中我得以知道，父亲在学业方面非常用功。1935年在实验心理学课上，他提出了一个发现：在布满薄薄的均匀的灰尘的穿衣镜前方（10到20厘米），对从眼睛引出的两条垂直于镜面的线与镜面的两个交点上予以专注注视，会呈现以这两个点为中心，如磁铁吸引纸上的铁屑

般向四周散开的现象。后来由他的导师、我国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周先庚先生执笔，报告了这一发现，以《个体的磁性光学错觉》为题，发表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美国心理学报》上（Vol. 51, 1938.7.3, P574-575），何礼（维登）以发现者的身份在报告中出现。这一发现反映了他在学习上的用心、专注和敏锐的观察能力。

父亲不仅对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对传统文化也有着良好的基础。在转学清华的面试中，王力先生出了很有难度的对对子的题。他当场对上，获得好评。为了向大众普及文化，他还热心研究汉字改革，结合心理学研究积极参加拉丁化拼音文字推广工作，负责由清华发行的《北平新文字》刊物的出版，成为近代文字改革的先行者。当年蔡元培、孙科、柳亚子等688位知名人士曾联名在该刊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可见该刊物在当时影响之大。若是太平盛世，他或许会走上学者的道路。“一二·九”前夕的一张自拍照片，他还在宿舍里平静地学习。然而



一九三五年何礼在清华心理系实验室

□ 怀念师友

当时日本侵华野心日益加剧，国难当头，他不得不离开书桌，与许多有志于救国救民的优秀青年一起，毅然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父亲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经历了运动的全过程。他于1936年6月，在清华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10月，北平各大学学生代表在燕京大学礼堂举行了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成立大会。王永兴、黄绍湘和何礼三人，经清华大学学生大会推选为代表，以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的身份参加大会。“北平学联”成立后，取得了公开的合法地位，并积极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当时清华大学在“北平学联”中分管交际（即统战），我父亲是“北平学联”的常委之一。由于“七七事变”的突然爆发，父亲没能完成在清华的全部学业，只差体育2个学分，这对曾代表南京中学参加过省中学运动会田径全能项目的他并非难事。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他毅然选择了肄业，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



在中央党校一二九研究班的清华学友们。
左起：韦君宜、叶方、黄秋耘、何礼

了革命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曾负责“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筹办了中共长江局的公开刊物《战时青年》，蒋南翔任主编，我父亲是编辑、发行人兼社长。此后受中共南方局派遣担任云南省工委青委书记和组织部长，领导西南联大和云南省的青运学运工作。“皖南事变”后调回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随蒋南翔领队的“中央青委五四工作队”赴东北开辟青年工作，接管和重组了哈尔滨大学（今吉林大学前身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团中央第一任学生部兼少儿部部长，建立了少先队组织。此后，相继在清华大学、教育部、华北局文教办和吉林大学工作，一直从事青少年教育和高等教育工作。

父亲去世的前三年，又一次和“一二·九”运动结缘。那是在1983年，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时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蒋南翔组织中央党校党史研究



何礼的清华肄业证书

班，负责研究和编写“一二·九”运动的简要历史。我父亲和韦君宜、黄秋耘、叶方4位清华同学被调去作为研究班的骨干。经过两年多努力，《一二九运动史要》专著基本脱稿，该书于1986年2月正式出版。在编写过程中收集查阅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访问了当年“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共百余人，邀请他们参加各种专题研讨会，在此基础上成稿并反复修改后定稿，成为一部传世之作，对当年曾经动员了千百万青年投入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洪流伟大运动，做了一个历史的总结，对今天的中国青年是一本有益的爱国主义教材。为了对历史负责，他们这

些年届高龄的老人对这项工作极其认真，耗尽了生命中最后的能量，大家一起过集体生活，炎夏寒冬都不休息。有一次出去外调，我父亲回来就晕倒了，住了20多天医院，同志们劝他回家休养，被他断然拒绝，还开玩笑说：“我这是舍命陪君子嘛。”在工作完成后的几年之内，我父亲和蒋南翔、韦君宜、黄秋耘这些当年清华的老同学、“一二·九”的老战友相继去世。他们一生的事业从“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和深入开始，到“一二·九”运动的回顾和总结结束，他们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不平凡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16年12月

回忆父亲周孝谦

——写于父亲百年诞辰

○周婉苏

周孝谦，1916年8月出生于浙江舟山，2014年9月2日在苏州逝世，享年98岁。周学长是苏州清华校友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届、第三届理事长，第四届至第八届名誉会长，他是一位优秀的清华学子，是我们后辈的楷模，从他身上可以充分表现出清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苏州清华校友会

我的父亲周孝谦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9年毕业。父亲是中国核物理学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理事）和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理事），长期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和教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的物理学工作者。他从事核结构理论研究近半个世纪，从液滴模型、壳层模型、综合模型，到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等始终走在前列。他是国内最早将群论方法应用于核结构及物质结构的研究者之一。建国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苏州大学教授、副校长。

父亲最心爱之物要数清华大学的毕业文凭。民国时期，毕业文凭上印有国民党党徽，在“文革”中“破四旧”抄家时，一经查出视若有罪，当时他已被迫无奈毁了家中祖传的一些珍贵旧物，而面对自己十年寒窗凝注的结晶，怎么都不忍心撕掉，最后只得违心地在上面积了叉，才得以保存下来。